

091.5

社会主义与国有化

[英] 盖茨克尔著

李 奈 西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序 言

休·盖茨克尔是现任英国工党領袖。这个被英国资产阶级报刊称为“可以算是保守的社会主义者或者甚至是自由主义的保守分子”，出身于一个英国殖民官員的家庭，是个典型的工党上层知識分子。他在大学經濟学科毕业后，曾在伦敦大学担任过政治經濟学的讲席，在战时內閣的經濟部和貿易部中供职，在战后的工党內閣中，又曾历任燃料与动力大臣，經濟大臣和財政大臣，是工党的所謂經濟专家。这本小册子，他自称是根据其在担任內閣职务时，“专心从事国有化工业”的經驗而写成的，实际上这本小册子的写作目的，是为了掩飾工党的“国有化”的失敗并宣传其现在所采取的更为右傾的綱領。

为了进一步弄清这本小册子的写作动机，有必要回顾一下战后时期工党关于国有化的理論与实践的簡單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鉴于英国人民群众对于资本主义制度越来越激烈的不滿，劳資关系尖銳，工人阶级政治积极性高涨，工党遂在 1945 年的大选中，提出了叠感性的竞选綱領，約許在当政后要把大部分工业实行国有化，对垄断組織实行社会监督，实行管制經濟、管制物价等等办法，他們大肆吹嘘这是要“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来建設社会主义”，“开始一种事业，这事业其实也就是大家都同意的革命”，借此轉移人民群众的革命情緒。大选結果，英国的资产阶级有意让工党出来組織政府，以便欺騙群众，維護和加强资产阶级的統治。

生产資料的国有化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首先取决于国家

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呢，还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呢，还是资产阶级专政？事实上，工党这种完全不触及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本质的所谓“国有化”，只不过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为了垄断资本的利益而实行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当然不可能有任何社会主义的意义。恩格斯在《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一书中早就指出：“……自从俾斯麦力倡国有化时起，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伪社会主义，它在有些地方甚至蜕化为一种自愿的奴僕行为，直截了当地把生产资料的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式的国有化，都宣布为社会主义。……这一切无论如何都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

1945年到1951年英国工党执政期间所实行的一些国有化措施，完全是为着资产阶级的利益而采取的。实际上是用这种国家垄断资本的形式来改造那些生产经营陈旧、落后的企业，以图弥补英国工业发展中不平衡的矛盾，借以巩固和加强英国垄断资本的經濟地位。

这种国有化具有下列一些特点：

第一，只限于对个别企业部门实行国有化，以便经过国家对这些企业的投资和低利的甚至是亏本的经营，为整个资本家阶级，首先是垄断资产阶级，提供更廉价的商品和劳务。

例如当时英国的煤炭、运输等部门，设备陈旧、经营落后，长期以来成为工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不大力加以改造、整顿，势必拖住其他工业部门的后腿，极不利于垄断资本的扩展。但是这样做投资大、利润小，私人资本既无力量、也不愿意承担。于是，工党政府“恰好”就对这些部门首先实行了国有化。

果然，在国有化以后，国家对这些部门进行了巨额的投资和整

頓，為其他工業部門提供了價格低廉的產品（而同時提供個人消費的產品價格却是昂貴的），滿足了壟斷資本的要求。例如，1951 年到 1952 年，工業用電耗用了二十五又四分之一百萬單位，只需一億零五百五十萬鎊，而民用电只耗用二十三又四分之一百萬單位，却需一億四千三百萬鎊。1952 年英國煤炭工業開采的煤有一半是以賠本價格出售的，但也是只利於工業用煤，民用煤的價格相反地在這期間提高了。對於這種情況，英國《勞工研究》雜誌曾一語道破：“所增加的采煤量得到的好處主要都變成了英國資本主義的利潤，因為煤炭是按照低於生產成本的價格供應的，所以資本主義利潤擴大了。”因此主要壟斷組織的競爭能力也更提高了。

反之，對於那些實行國有化就會對壟斷組織不利的部門，工黨政府是決不施行國有化的，例如，正在它高唱國有化的時候，它卻把戰時由國家經營的一些軍火工廠，毫不猶豫地移交給私人經營。

第二，在實行國有化的企業中，仍然由原來一些資本家的經理人物掌握着管理和支配的大權，從而保證了這些企業的管理方式、經營方針完全是按資產階級利益辦事。

根據 1949 年艾德禮在下院回答質詢時的供認，當時各種國有化中央管理局共有委員一百三十一人，其中幾乎有一半是過去私營公司的董事、經理，而其餘的委員中，有二十三個是爵士，九個是地主，三個是將軍，只有少數走紅運的右翼工會上層分子被安插在這些企業中，工人們仍然被排斥在企業管理之外。

蓋茨克爾在本書中也不能不承認，人們抱怨“在經理部門可以看到‘同樣的面孔’”，可是，他卻還認為對這些資本家老爺們安插得太少了，哀嘆“很難說服有才干的人從私營工業轉到國有化工業去任職”呢！

第三，這些國有化企業仍繼續以補償和付與投資利息的名

义，从企业的收入中拨出巨额的款项向原业主、股东和投资的垄断组织纳贡，从而使这些资本家仍然享受着大量的工人的剩余劳动价值。

工党政府在进行国有化时，曾给予原业主以优厚的补偿，这种补偿是按高涨时期的利润确定的，因而使原业主摆脱了在自己经营时要担当的危机的风险，而获得有保证的丰厚收入。例如当时煤炭工业的矿山老板们本来已无法指望从其落后的企业中得到多大的利润，但在煤炭业收归国有后，他们却可安然得到有保证的收益——国家公债。无怪乎连工党的大臣也说：“难道他们不会因此而心满意足吗？既然煤业已窳陋不堪，那末许多矿山主是很乐意摆脱私有矿井的。”工党对于交通运输部门的国有化，情形也正复如此。

据统计，资本家从整个国有化部门获得的补偿总额高达二十五亿英镑左右。仅在1952年这一年，国有化企业付给资本家的补偿费和投资借款利息就在一亿英镑以上。当然，这笔沉重的负担不言而喻地完全转嫁到工人头上了，因此，国有化企业工人所受的剥削反倒更为严重。工党领袖常爱说国有化部门的工人工资低、生活水平低，是由于这些部门“亏损”了的缘故。可是他们却隐瞒了正是这笔沉重的贡赋，导致了这些企业“亏损”的事实。

综合上述特点，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与工党在竞选纲领中所吹嘘的相反，这种国有化不是消灭了资本家的利润，而是给资本家带来了较前更大的收益，“这是他们在私营时期所梦想不到的”（1949年12月3日摩里逊在列非色姆的演说）。英国的资产阶级对于这一点，当然是肚里有数的，所以保守党人在1951年上台以后，依然保持了工党政府对国有化的基本法令（只是把钢铁工业和部分货运汽车交通事业发还私有。本来，工党对于钢铁国有化就

會一再躊躇，施行后又特意原封不动地保存了原私营公司的組織机构和經營人員，早就准备日后发还私有)。对于这一点，英国工人从切身体驗中也是領教了。战后时期在国有化企业中罢工的总人数占到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便是英国工人对工党欺騙政策的行动回答。

这一切完全証实了恩格斯上述的論断。

面对着这种国有化的破产，工党的右翼領袖們又急忙开动宣传机器，創造一种新的“理論”来欺騙人民。其集中表现就是 1957 年在布萊頓召开的工党年会上他們所通过的名为《工业与社会》的綱領性文件。在这个文件中，他們踐踏了自己在战后初期对于国有化的偶像宣传，竟进而为壟断組織辯护，索性連那种虛偽的国有化主张也不要了，其立場較 1945 年时更为后退。他們袭用三十年代美国的反动学者貝恩海姆·貝尔和敏斯等所“发明”的“管理革命論”，公然歌頌壟断組織的“进步”性，胡說什麼在这种公司里，經理是脱离股东而支配企业的，“經理对生产的关怀正如同对利潤的关怀一样，并且他們对扩大生产要比对紅利考虑得更多一些”，因而在壟断組織里已实现了“管理革命”，“私有制的职能縮小了，或者是縮小到已經不再起任何作用了”，大公司已不再唯利是图，而“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所以不需要对它們实行国有化等等。这种“管理革命論”的詭辯是如此荒謬，簡直不值一駁。因为誰都知道今天英国国内的及其殖民地經濟的主要部門，都是被几十个金融寡头掌握着的，他們通过各种壟断公司，榨取着駭人听聞的高額利潤。沒有任何迹象足以說明这些公司的經理不是对金融寡头俯首帖耳的，怎么可以說壟断組織不唯利是图了呢？工党的右翼領袖們，用如此貧乏的謬論来招搖撞騙，只能表明他們是如何地理屈詞穷！

明白了上述这些背景，我們便容易了解盖茨克尔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与国有化”的题目来做文章，也便于透过他那曲折詭辯的行文掌握这个小册子的基本内容和中心目的。

盖茨克尔是英国工党中所謂“新思想家”之一，他們标榜的“新思想”，就是力主放弃各种“陈旧的”社会主义要求，使党的綱領、策略去适应资产阶级的利益。假如說过去工党領袖还要在表面上攻击一下垄断资本主义，主张实行一些改良主义的“改革”，作为他們背叛工人阶级的遮羞布的話，那末，这些“新思想家”們，就赤裸裸地歌頌垄断資本，連这种“改革”的把戏也不敢提倡，而索性断言可以經过垄断資本来实现“社会主义”了。工党新的綱領文件反映了他們的主张，盖茨克尔这本小册子也正是配合綱領的主张来宣揚这种思想的。

盖茨克尔写作这个小册子，一方面是替工党的国有化的失败作詭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販卖所謂不必对垄断資本进行国有化，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謬論。

在这个小册子中，盖茨克尔虽然被迫承认工党的国有化实践并不能达到“社会革命”的目标，不能“消灭不劳而获的收入”，“因为补偿意味着还有源源不絕的不劳而获的收入繼續存在，只是所表现的形式是利息而不是利潤或紅利罢了。”从而在事实上否定了过去工党关于国有化成分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謊言。但是，盖茨克尔絕不是由此前进，得出需要打碎现存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結論。相反地，他却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个根本性的問題，一再重弹阶级合作的老調，強調“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政策”必須一視同仁地在施行国有化时給予資本家以优厚的补偿，并且必須“通过議會民主”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

因此，在为工党的国有化辯护时，盖茨克尔就閉口不談这种国

有化究竟是对那个阶级有利这一关键性问题，而在所谓“效率”上大做文章，列举国有化如何精简了重叠的机构，如何扩大了生产等等。当然，那些所谓国有化企业经过国家大量投资，进行生产改组后，机械化程度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自然会有所提高的。问题正是在于这种提高的好处归谁所得？盖茨克尔恰恰就不敢回答这个问题。

使用了同样的手法，盖茨克尔把国有化的缺点，归结为经营管理的规模过大，管理人选的物色困难，甚至是由于国营企业管理人缺乏“个人主义”的事业心等等，仿佛并不是这种国有化的资本主义性质，才导致了它的必然失败哩！

鉴于工党从前那种宣传的破产，盖茨克尔在这个小册子中断言，实现“社会主义”和国有化并无必然联系，并厚颜无耻地为过去的宣传辩解道：“政治斗争中产生的情绪在双方面都会引起神话的流传。以后发生的事情并不象在政治上最易激动的人所料想的那样好或那样坏。”一个政党领袖把自己党的政策纲领性的庄严宣传，轻描淡写地用“情绪激动”四字来推诿责任，这个政党的纲领的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那末，怎样来实现他们自己标榜的“社会主义理想”呢？

盖茨克尔提出，一个办法是向资本征收重税，即他所說，“包括遗产税在内的特别税”，“在纠正财产和收入的不公平的分配方面，肯定是比少数工业部门的国有化起了远为重要的作用。”但是，要资本家的国家用向资本家课税的办法来消灭资本家，这不是天真的童话吗？资本主义国家所有的课税（包括遗产税）的长期历史早已证明这些只是骗人的空话，连盖茨克尔也不得不丧气地承认：“高额遗产税、所得税和附加税在实施时所产生的效果是迟缓的。”

那末，出路何在呢？盖茨克尔于是开出了第二个绝妙的丹方：

这就是应当把公有权和国有化区分开来，用所谓“扩大公有权”的办法，即由国家收购各个公司的股票，成为它的股东，即可实现“社会主义”。据说这样一来，“政府甚至不必对个别公司——更不必说一个整个的工业部门——行使详尽无遗的控制，也许就可以成为工业、商业或农业的财产所有人。”为什么只要成为股东，甚至不对这些公司的业务进行监督就能实现“社会主义”呢？他所持的理由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那种“管理革命论”。即因为“一切私营公司直接为赚得最大限度利润或付给最高红利的欲望所鼓舞的程度，是可能被夸大的”，“在一些较大的企业中，所有权和管理权分得很开，只要业务经营得相当顺利，股东对经理部门的影响是很小的，因而较大的私营公司也不是完全象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唯利是图的”，“即使在私营企业方面，也肯定能比现在更进一步地促进民主的发展。”如此等等，似乎就用不着对垄断公司进行任何监督、触动，只要政府收买了股票，便立刻能“消灭不劳而获的收入”，而实现“社会主义”了！

政府靠什么来收买股票，实现“公有权”的扩大呢？盖茨克尔说，可以用“征收遗产税”，“或者用预算节余的收入”，“或者，如果政治条件允许的话，则向资本课税”等三种办法。我们知道，在现代帝国主义大肆扩军竞赛的今天，所谓预算节余只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关于遗产税和向资本课税，前面说过，连盖茨克尔也认为此路不通，才乞灵于所谓“扩大公有权”的。这样，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逻辑，因为课征遗产税等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因此，才要“扩大公有权”；而为了要“扩大公有权”，首先又要靠课征遗产税等。好一个奇妙的迴旋木马！

总之，现存的垄断组织不必触动，只要“扩大公有权”就可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至于如何实现“扩大公有权”，则请等待那“迟缓

的”，也就是說不可能的課稅。工人階級已經無事可為，坐着等待“社會主義”吧！這就是現今工黨關於“社會主義”的“理論”。

列寧在評論英國的老牌右翼社會民主黨人時，曾經說過：“資產階級需要的是這樣的奴才，他們能得到一部分工人的信任，用可以走改良主義道路的言論給資產階級臉上貼金，用這種言論來蒙蔽人民的眼睛，胡說改良主義道路的美妙和可能性，使人民脫離革命。”^① 我們從蓋茨克爾的這本小冊子中，又一次看清了現今右派社會民主黨人的這種最無恥的嘴臉！

弓 人



^① 《論第三國際的任務》，見《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5頁。

目 录

前言	2
第一章 社会主义理想	3
第二章 由来已久的問題	7
第三章 今日的国有化	9
第四章 国有化的成就	25
第五章 經驗的問題	33
第六章 国有化的前途	42

前 言

这本小册子大部分写于 1953 年，原拟作为计划写作的一卷论文集集中的一章，不幸这本书始终没有完成。承费边社建议把这本小册子以现在形式出版，我已欣然同意这个办法。但我没有能够彻底地加以修正，也没有能够参考 1953 年以来有关各种国有化工业的文献——特别是关于电力供应工业的赫伯特报告和关于国家煤炭管理局的弗累克报告。我写这篇东西，主要依靠我担任工党政府阁员时在一个时期专心从事国有化工业所取得的经验。因此，其中有些部分可能已经过时。此外，本文原来是作为许多论文中的一篇写出的，因而篇幅有限，许多重要问题就只能略而不谈。特别是完全没有谈到合作社的生产、销售、分配以及它们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对于这一重要问题，写得太少了。虽然如此，我希望这本小册子仍能引起辩论。

休·盖·

1956 年 6 月

第一章 社会主义理想

最近看到的关于国有化的文章，多半是討論新的国有化工业的作用、它們的成就和缺点、它們的立法和行政体制、它們与各部和議會的关系，以及其他类似的問題。

虽然我将在这本小册子中說到这些問題的某几項，它的范围却比較广泛，并且是有所不同的。它主要是关于国有化与公有权的关系，以及英国工党所主張的社会主义的更加广闊的最終理想。

这些理想是什么呢？我們不是一个喜欢空談的政党：我們并不詳尽无遺地发表一篇責成每一党員必須逐字逐句地加以拥护的精密宣言。我在这里所发表的議論，只代表我个人的見解，虽然我希望它能够在英国社会主义者中間获得相当普遍的同意。

社会平等

首先，我們的目標是求社会平等。这在我們看来，实质上就是社会正义。我們认为，如果一个人的收入、生活方式、教育、身分和人生的机会都完全取决于他出身的階級，那么这种階級結構就是不公道的。我們不同意这样一种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仅仅因为一个人的父母偶然属于社会的某一阶层，就认为他比另一个人优越或低下，而不管其个人的品质如何。

我們并不是說所有的人都应当有同样的收入；但另一方面，我們却认为差别应与价值的公认的标准相关联——譬如工作的性质——对于髒的、比較劳累的、比較熟练的、质量較好的、責任比較重大的工作，要多給一些报酬。我們也說，这些差别只以有必要为

了经济发展而提供足够的刺激为度，不应更大。我们认为一切人都应当有同等的机会，并且我们主张，只有在私有财产得到公平合理的分配，因而遗产的继承范围有了严格的限制之后，一切人才有可能享受同等的机会。

但会不会有机会均等呢？人们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差别是不是会使机会均等成为一场空梦呢？

当然，有些孩子比别的孩子聪明些，或者更勤快些，或者更强壮些，或者更健康些，这是事实；这些差别在他们的一生中会起很大的作用，这自然也是事实。但首先，这不足以成为反对至少向那些才能大约相等的人提供同等机会的论据。可是我们连这一点也还没有做到。

其次，社会有义务来帮助天赋较差的人克服他们的不利条件，而不是使人人都完全一模一样——但愿不是如此！

我还必须纠正另一种误解。“机会均等”这个词有时被人理解为指一件具有高度竞争性的唯物主义的事情，所有的人都在同一条线上出发，毕生从事竞争，以尽量地积聚财富。我指的不是这个意思。我当然不轻视要求“上进”和要求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平的愿望；但我认为，如果一个社会里的大多数人把这种愿望当作人生的唯一动机，那么这个社会是根本不能令人满意的。我所指的“机会均等”是人们在追求幸福方面有均等的机会，不论他们抱什么决心，他们都能很好地达到这个目的。

我不认为规定和宣传一套规章是政府的事情。毫无疑问，必须有一些规定许可项目的和姑且试行以观后效的法律——但这些至少都是消极的。如果政府要去指导普通人民如何追求幸福，那对于个人自由来说，就未免干预太多了。这件事情最好让宣教师、牧师、教师和诗人——我想今天一定有人主张加上精神病学家——

去做。这样的事采用說服、討論和示范的方式比用法律規定可以收到远为良好的效果。人們寻求幸福的方法各有不同，那的确是—一个事实。有些人通过艺术或智慧的发展，有些人更着重于庸俗的和唯物主义的追求，有些人——可能是絕大多数——則利用家庭生活 and 亲朋关系。

但是曾經有过、而且現在还有一些誠实而热情的改革家却采取与此不同的看法。他們不仅相信，参观一个美术陈列館或参加一次古典音乐会比看足球賽或在家里讀小說要强，而且还相信，使人們宁要前者而不要后者是政府的事。但据我看来，对于幸福的追求向来总是属于个人私事的性质，大体上最好让人们自己去抉擇，虽然在这些問題上他們的作出明智抉擇的能力显然是有限的，假如他們从来没有机会欣赏音乐会和足球賽的話。政府的职责是設立机构和提供机会，使人們能有为自身謀幸福的最大可能性。

充 分 就 业

社会主义的第二个目标是經濟保証或充分就业。这一向是工党政策中的一个主要項目。当你考虑到失业本身和对失业所抱有的恐惧心理已經毁灭了多少生命的时候，这是不足为奇的。还没有人作很多尝试，用确切的、有分量的說法来闡述充分就业問題。人們已經看出并往往很清楚地了解到，不能把充分就业理解为含有保証人人都能終身保持同样的职业的意思。那就会引起經濟萧条。但这曾被解釋为至少意味着：可以找到的职业比要找职业的人来得多。

人們常常把充分就业的这个目标和下列另一个目标相提并論：即达到最大限度的生产力，保証很好地組織和使用一切可用的人力和物力，以及一切最新的技术，以便提供尽量多的貨物和服

务。不論这个目标是否算是一个不相关联的目标，我們肯定是应当提到的。

因为，尽管經常有反面的宣傳，工党不仅打算更公平地分配現有的产量，还企图使大量的产品得到更加公平的分配，这样不仅可以提高这里的生活水平，而且还可以使我国在帮助世界上比較貧穷、比較不发达的国家方面起更大的作用。

工业民主与合作

第三，我們的目标在于工业民主，所謂工业民主，指的是工业中气氛和关系的改变，这种改变会給工人以更好的地位、更多的权力、更大的責任和参加工业的眞实感。总之，我們要在人們的劳动生活中看到我們业已享受的政治民主和我們准备实现的更大的經濟平等的反映。

我們也想看到更多的“合作”——人們賴以共同为公共利益作出更多貢獻的更融洽的关系。实际上，我們不容易把这作为最終目标的理想，同我們无疑地希望其产生更和睦的关系的社会平等的理想分开，另一方面也不容易把它同工人們借以获得更大一部分的监督权和責任并享有更大的主人翁感的工业民主制度分开。

总之，我們想創造的，是一个沒有社会階級而有上述含义的机会均等、高度的經濟平等、充分就业、迅速发展的生产力、工业民主以及社会成員間普遍合作精神的社会。

而且，我們还打算通过議會民主来逐步实现这些理想，因此我們把保持議會民主看作是同等重要的目标。这就是說，我們必須漸漸地、一步一步地前进，使同胞們相信，我們的目的是正义的，我們所选择的手段是最适合推行这个目的的。

第二章 由来已久的問題

可是，怎么办呢？这就向我们提出了国有化的問題。

任何人只要稍稍考虑一下都会同意，国有化既然是工业管理和所有权在制度上的转变，就必须被当作一种手段，而不应该同上述的最終目的混为一谈。人們所以往往把国有化当作目的，并或多或少把它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是因为一向有人把它看作必然能达到預期目的的唯一可采用的手段，而不是把它看作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一种手段。这既适用于国有化，也适用于公有权。前者一般人理解为由国家接收全部工业，因而工业也就为社会所有，并为社会的共同利益而加以监督管理；而后者严格地说来是指社会占有任何财产，不論其是否为工业财产，也不論是包括一門工业的全部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下文我还会提出来再谈一谈。

但是，为什么以前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的这些最終目的只有通过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国有化才能实现呢？对于这个重要問題有四种答案，可以大致符合我們的四个目标。在这里我将首先說明一下，不作任何評論。以后再比較充分地加以分析。

消灭不劳而获的收入

第一个答案本质上是基于劳动价值学說的馬克思主义的論証。不劳而获的收入的洪流——地租、利息和利潤——是資本主义的根本禍害；它代表着資本家为了剝夺工人的正当收入而向他們征收的稅捐。不管怎样分配，不劳而获的收入的本身本身就是錯